



从胡乔木的提问试论汉语的声调和节奏(摘要)

吴宗济

1981年6月,当代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从美国回来探亲,在北京访问了几处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临行前夕,蒙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同志扶病为其饯行,在席中向赵先生询问有关汉语的声调分类及诗歌的字句结构等问题,匆匆未及细谈。次日又一早特派专人送达一信,继续前问,希望赵先生回去后能便中解答。但不久赵先生和胡院长均因病谢世,此信遂成悬案。最近我因参加赵师全集的编订,得见此信。深感乔木同志的关心语言学、能连夜写出如此条理清楚、引证详实的一系列问题,这些在语言学界看似浅近平易、少有叙述的问题,实际上却指出了汉语声调的主要特征;但由于科学知识在历史长河中是逐渐发展的,不要说我国、即使在西方的先进国家、对这个问题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前,还仍如乔木同志所强调“不容易讲清楚”,有些解释还是“一个不充足和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如今为了不使提问者的苦心谆嘱湮没无闻,这件在语音学研究上可称为历史文献的书信,理应予以发表,并引起跨学科的语言学家的探索兴趣,庶可代替赵师的回答。笔者不揣浅陋,也打算补充一点“不充足的解释”,借以抛砖引玉。

乔木同志的原信全文如下:

“赵老:

昨天向您提出的问题,因限于时间,说得太简略,很难表达出我为什么要重视这个似乎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因此再多说几句,请您原谅。

(一) 平仄如果只是一种人为的分类,而没有某种客观的依据,很难理解它为什么能在一千几百年间被全民族所自然接受,成为“习惯”。

(二) 这种习惯远不限于诗人文人所写的诗词骈文联语,而且深入民间。过去私塾里蒙童的对对并不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巧对的故事也并不限于文人。民歌中常有大致依照平仄规律的,如著名的“山歌好唱口难开”,“桃红柳绿是新春”,“赤日炎炎似火烧”,“月子弯弯照九州”(后二者可能出于民间文人)等。甚至新诗中也有“教我如何不想他”,“太阳照着洞庭波”这样的名句。

(三) 平仄之分,至少在周代即已开始被人们所意识到,所以诗经楚辞中用平韵的作品,远远超出用仄韵的,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后来历代诗赋词曲和现代的歌谣、歌曲、新诗,一直没有有什么改变。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平声和仄声确有明显的虽然是不容易讲清楚的区别,无论各自的实际调值在各时期和各方言有多大不同。而且这个现象也包括北京话地区在内。平声字多似乎是一个理由,但是是一个不充足的和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它还引出另一个不容易答复的问题:为什么汉语里平声字多!

因为这些,我想平仄的区别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久已思考而未见有人解答的,即中国诗歌何以由诗经楚辞的偶数字句型为主变为两汉以后的奇数字句型为主?偶数字句诗除辞赋体外,六言诗始终不流行,八言诗根本没有(当然不算新诗),奇数字句诗基本上也只限于五七言(不包括词曲),在民歌中大多数是七言。新诗出现以后,情况再变,基本上以偶数字句型为主,而且一般句子的字数也多在八言以上

(这里没有考虑自由诗)。这个新起的变化因为是现代的,可能比较容易解释,但是四六言变为五七言的语言学上的原因就比较不清楚。是否古汉语的发展在此期间出现了某种重要变化?

向您这样高龄的前辈提出这些问题,于心很觉不安。不过我终于不肯放过这个求教的机会。您在返美以后,如能把您的一些想法告诉赵如兰教授(我所提的问题我想她也会感兴趣的),请她给我回一封信,我就感谢不尽了。

祝您和如兰女士一路平安,健康长寿!

胡乔木”

全文: [2002\\_1.pdf](#)